

试论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

刘乃和

陈垣同志是我国当代卓越的史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从事教育工作达七十年，作史学研究也有五十多年，是一位既笃于教学，又勤于著述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典范。今年十一月十二日是他百年诞辰，我在学习他历史著作的同时，谨对他的史学研究做一初步探讨，以为纪念。

他是1880年生，1971年逝世，在他九十一岁的一生中，在家乡广东三十多年，其余近六十年时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在广州时，政治上曾参加过反帝反封建活动；学术上，除在医学院读书、工作时学习医学外，其余大部分时间，主要是熟读“四书五经”和其他经书，并按《书目答问》和《四库简明目录》《四库总目提要》研究文史各部目录之学。但是，很多书在广州找不到，所以他盼望着能有机会看到《四库全书》。

到北京后不久，他得知文津阁《四库全书》刚从热河避暑山庄运到北京，存放在北京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还没有正式对外借阅，也还没有编出馆藏和借阅目录。这时，陈垣同志便想办法找到阅读《四库全书》的机会，每天到馆，早去晚归，如是者前后十年。他把《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研究得非常清楚，并翻阅了其中大部分书籍。当时流行的赵怀玉本《简明目录》，是全书尚未完

成时，被人带到宫外印行的，后因文字狱的株连及其他关系，全书抽换不少，故目录与藏书不符。当时京师图书馆因还没有实际藏书目录，就暂时用《简明目录》借书取书。他对《四库全书》研究后，对其有目无书或有书无目以及抽换经过，和全书排架情况，了如指掌，而馆中管理人员却不知目录与馆藏有出入。陈垣同志有时故意提出目书不符的书，请馆员去取，馆员找不到，只好让他自己找，他走进书库，举手而得，馆员很是佩服，从此让他搬到书库去看，不必再办借阅手续。由于他全面研读了《四库全书》，所以对目录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为他后来查找史料、著书立说，开辟了一条通渠大道，给他后来的高深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他青年学医学时，虽写过医学史的文章，但他开始作史学研究，是在来北京以后。

他在医学院时，因接触到外国基督教人士，所以开始注意了基督教。来到北京，很想编写一部基督教史，于是多方搜求这方面材料。

一九一六年春，读到英敛之《万松野人言善录》，在书里得知英老先生藏有不少明末清初基督教著作，就冒然写信给还不相识的英先生商借。英先生喜读书，并愿和读书人来往。见有人来信借书，非常高兴，便把所藏有关书籍，“倾筐倒篋”尽量借他参考，并介绍他到北堂图书馆阅读。两人书信往还，商讨问题，终于成了莫逆之交，后来他到辅仁大学，就是由英先生的推荐。

英敛之，名华，满族人，天主教徒，精研文史。清末创办大公报，民国初年退隐香山，号万松野人。在香山创立辅仁社招收

各省教会青年子弟数十人，学习文史。

英先生在辅仁社为学生出题作文，自己批改，作为学生日课。一次出“元也里可温考”一题，陈垣同志看到学生课后，很有兴趣，试作一篇。文中广征博引，有独到见解，英先生看后，大加赞赏，认为文章有水平、有见解，自己远不如他，便马上替他印行。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者注意。这年年底，他到日本访书，在一次学术集会上宣读此文，得到很高评价。

这是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研究专著，是专用中国史料考证元朝基督教情况的论文。

继这篇专著后，他继续对古代外来宗教进行探讨，写成论文的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考证明朝以后犹太教在中国传布的情况；《火袄教入中国考》，是研究火袄教自南北朝时北魏、南梁从波斯传至中国，历隋唐至宋代发展衰微的历史；《摩尼教入中国考》，研究摩尼教自唐代传至中国，及在中国传布的情况。他后来把这四篇专著名为“古教四考”。

一九二三年他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考证元朝西域人学汉文化的情况，从大量具体事实中说明西域人华化的程度，参考有关元朝民族、宗教的各种资料二百余种。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学者称赞，蔡子民先生称这书是“石破天惊”之作，日本桑原隲藏认为此书“征引考核，殆无遗憾”，“非独为研究元代历史，即研究支那文化史者，亦有参考此论著之必要”。一九六六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华裔学志》刊载了钱星海和古德里的英文译注本，前言中说他们译注原因是“由于舆论界对这书所给予的高度评价”。译注时距原著发表已四十余年了。

这时，他仍想写一部基督教史，继续在做积累资料的准备工作，并不断有关于基督教史的文章发表，如《元基督教徒之华学》、《基督教入华史略》、《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从

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以及包括《吴渔山年谱》在内的有关吴渔山和其著作《墨井集》的八篇论著。

他为基督教史写了人物传记，先后撰有李之藻、王征、金声、许缙曾等传。后来他称这四篇文章为“基督教人物四传”。

虽然他在为基督教史积累资料过程中，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后因种种原因，基督教史的撰写计划，未能实现。

他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是从研究外来古教时开始的。他曾着手编写《中国回教志》，大致轮廓，早已拟就，并立出总目，包括：宗教、典礼、氏族、户口、寺院、古迹、金石、经籍、人物和大事等十个志，最后拟附《中回历对照年表》、《历代哈里发世系表》、《唐宋辽大食交聘表》和《元明清回回科第表》等四表。总目和四附表的材料已大体搜集完备，后因户口、寺院、古迹、金石等部分，一定要经过在各地实际调查才能动笔；而在旧社会他只是个人钻研，没有集体组织，也没有外力支援，像这样的调查工作，当时不可能进行，而且他说当时中国的伊斯兰教团体，“组织不完备，调查殊感困难”，因此这部著作无法进行。后虽拟缩小范围，变换体例，改写《中国回教史》，但也因故未最后完成。只将其中伊斯兰教传进中国的情况，写成《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独立成篇，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曾用这专题作过一次学术报告，由当时研究所学生冯沅君记录，记录稿经他自己修改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发表。《东方杂志》转载时，改题为《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文章最后说清政府对回族极残暴，故回族多次进行反清斗争，自乾隆中叶到光绪初年的一百年间，起义不断，规模较大的就有五次，虽都遭清统治者残酷镇压，但反抗力量，历久不衰。

他一向注意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汉族与回族的关系。在他的著作中，特别重视民族团结。他认为伊斯兰教在宗教上从未和汉

族人民发生过冲突，他们在社会上不公开传教，也不攻击儒家。汉族人民对他们不嫉视，历史上从来未发生过象六朝及唐朝 元朝那样佛道相争的情况。唐武宗会昌毁佛，外来各教都遭波及，独伊斯兰教“千年来元气不伤”，从来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剧烈攻击，没有出现过象唐韩愈辟佛、明沈淮参天主教等类似事情。但是象顾炎武、杭世骏等著名学者，每著书立说，都对回族持蔑视态度，这是很不公平的；清政府又对回族人民残压虐待，横暴杀戮，回族人民“不堪其虐，不能不奋臂而起矣”。

他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公允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反过去学人的歧视和诬蔑，是难能可贵的。

解放后，他在《衷心喜悦话史学》（《红旗》1962年第19期）中曾说：

我过去因为所看到的古籍资料里有关回族的记载，无不贯串着种族歧视和压迫，非常气愤，决心进行回族史的研究。

就是说的这时期的事。他说：

这时正好在研究院毕业生里有一位回族同学，我和他说：“你们自己研究比我条件便利，我已打了一点基础，希望你们能把回族史写好。”

后来他就未再撰写这方面的文章。

二十年代，他的研究项目虽也曾涉及到和佛教有关的内容，如他研究过《慈恩传》、《大唐西域记》的撰人辨机、《四十二章经》等，也写过《佛教能传布中国的原因》等文章，但较系统地研究有关佛教史的问题，还是三十年代后期的事情。

抗日战争前后，他开始致力于佛教史的研究。为了了解佛教，他首先把几部大部头的佛藏都浏览阅遍，对《嘉兴藏》、

《大正藏》、《磧砂藏》的内容编排、收书异同、成书前后等等，作了全面地深入地钻研；并把藏书中有关佛教史的书籍和僧人语录，翻阅几遍，阅读时随手摘录积累的材料盈架盈尺，成为后来他撰写佛教史专著的重要参考资料。

他并把阅读释典僧传及其他著作所见到的僧家年腊，随手记录，将清朝以前的二千八百多僧人，都考出其生卒年，确定了很多历史上悬而未决的僧人生卒年问题，写成《释氏疑年录》这部佛教史重要工具书。

一九三八年，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著《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汤若望是天主教神父，木陈忞是佛教僧人，二人原无联系，故这题目一经刊出，引起学人很大兴趣。同时写成《语录与顺治宫廷》，语录即指他“阅藏”所抄僧人语录。并且考出久有争论的顺治皇帝出家问题，这是他“阅藏”后最初写成的几篇有关佛教史的文章。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主要是介绍佛教史籍大概流传情况，以及他对释典书籍研究的心得、见解和评价。全书考证精辟，把文史工作者不常接触的佛教史要籍，较通俗地加以介绍，对一般认为奥秘难解的释典，得以了解，对于学人探索、使用释典资料提供了很大方便。

他利用在藏经中摘录的大量语录，又参考释氏以外的著作，撰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两部论著。

他不但注意了佛教的大丛书《嘉兴藏》等等，并且也钻研过道教大丛书《道藏》。他将《道藏》翻阅过几次，把《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缪荃荪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是其中有关道教史的资料，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道教碑一千三百余通，把这些材料编成《道家金石略》一百卷，以作为研究道教史的参考材料，全书约八十余万字。但因有的碑文漫漶难辨，有的

碑文上下长达丈余，抄录不易，错简衍漏繁多，校雠不易，当时不拟付印。他利用其中资料，写成《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这是他在抗战时期重要著作之一。

后来他将抗战期间写的两部佛教史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这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合称为“宗教三书”。

解放后，他虽在一九六一、六二年写过《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佛牙故事》和《法献佛牙隐现记》等与佛教有关的三篇文章，但未再写其他宗教史论文。

宗教史的研究，是他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涉及的范围较广，从“古教四考”到“宗教三书”，从已消亡的外来古教到现存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都有过探讨，也都有过专著发表。他对任何宗教的研究，只着重其传布、发展、衰亡的历史，或某宗教中的某一问题的研究，或者是对其教史的书籍介绍等，不涉及其教义。

他写宗教史论文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了以前学者所没有引用过的佛藏里的僧人语录，和道藏里的道家碑记，融贯内外典籍，荟萃成章，为史学研究者打开了佛道丛书里的资料宝库。他的著作，大都引用博广，论断精审，为前人所未为，在不少方面填补了宗教史研究的空白，有的则提出创新的见解，对我国宗教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

(二)

陈垣同志治学，很重视历史文献学和历史辅助科学，他认为这是基础知识，不学好不足以谈史学研究。他教学也是注意设置基础课程，注意教给学生基本知识，培养学生掌握基本功，使同学

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本领。

他在二十年代首先在大学历史系一、二年级设置“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和“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两个课程。“选读”课是为了解决通晓古汉语的问题；“评论”课是给同学介绍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著作的课程，内容从二十四史讲起，评论各种体裁的名著几十种，包括各书的内容、书的优缺点、时代背景、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等等。我在大学读书和留校工作后，多次听过这个课程，而每次讲授的内容都不尽相同，每年教材的取舍和侧重都有所变换。

这两个课程的设置，被沿袭下来，后来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文选”和“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两个课都是为了给初入历史系的同学打好基础而设的。

他常常在历史系三四年级开设他自己设计的一个课程“史源学实习”，这个课重在考证史源，通过每两周一次的课业实习，锻炼同学在校读书期间就能亲自动手查找史籍，判断是非，识别正误，和构思寻绎，组织材料，撰写文章的真实本领。经过较严格的训练，同学的学习是较扎实的。现在我每遇到旧时同学谈起，都感谢他为大家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启迪我们的治学门径。

他所以能够读书有成，完全是依靠自学而来的。他年轻时虽读过私塾，但只是死背硬记“四书五经”；虽读过四年大学，但上的是医学院，学内科、病理、人体解剖。他抛弃医学转为从事史学研究活动时，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他后来可以从容地进行史学研究，颇得力于在年轻时熟习了目录学。因此他每谈到自己读书经验时，常愿意告诉人们应从目录学入手，但他说这是几十年前他自己摸索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于现代青年的情况。尽管如此，他自己得力于目录学却是肯定的，所以后来他一直注意目录学这一课题。

他研究某一专题时，总是先在与这题材有关的目录学方面作准备。研究基督教史时，先做出《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目录包括天文、历算、地理、艺术、说教等部分，将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的基督教著作都一览无余，然后才开始撰写论文，所以他二十年代在北师大教授“宗教史”时，也是先把这个目录作为此课的讲义印发给同学。

研究佛教史时，他先熟习佛教史籍，对各朝各代重要佛教史籍的渊源变化，作了详尽地了解，然后才动手撰写专著。

研究元代历史，需要参考《四库全书》中元人文集，但《四库全书》所收文集，例无总目，他就先把《四库全书》中罕见的元人文集作出《元六十家文集目录》，以利于搜集资料时参阅方便。这本目录，北京图书馆和内蒙古大学历史系都曾录成副本。

他也很注意年代学，认为不通晓年代学，就很难进行历史研究，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在他决心进行古宗教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时，常常遇到回历与中西历对比的问题，中外史籍记载，每遇到中、西、回三历时，往往参差纷乱，使人无所适从。不解决中西回历互换的问题，专题研究就不易进行。于是他先用了四年多时间，把回历与中西历对照的工具书作好，这就是有关年代学的两部有名著作《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这是我国第一次有中西回三历对照的年代工具书，尽管这书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两部书给学者以极大便利。

在阅读古代文献时，常会遇到历代君主名号避讳问题。避讳是我国历史所特有，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凡读清朝以前的历史书籍时，都可能遇到这个问题。各朝所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史书上有不少因避讳而改易文字的地方，甚至改前人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辄使古书淆乱不清。他认为，

避讳事虽小，但不能掌握，就会给阅读古书、引用资料时造成障碍，对古书上的某些问题也无法解释。如果懂得避讳学，不但可以解决这些困难，且可利用它以辨别古书、文物的真伪，并可审定其年代。避讳学是读史必不可少的知识。因此他决心把历代避讳问题作一总的概括。

一九二八年，他撰写了《史讳举例》一书，书分八卷，举出八十多例，分析并论述了历代避讳所用的方法，避讳的种类，和如何利用，以及与避讳有关的诸问题。最后列出历朝讳例，可供读者检查，这是一部关于避讳的总结性著作，是为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校勘学也是他重视的问题，他认为有人可以专门作校勘古书的工作，但历史系同学也应当对校勘学有些了解。

解放前，他曾开过一个课程，名“校勘学”，考虑这门课程用什么书作课本时，他很费了一些斟酌。因讲校勘学就应有实际例证作教材，因为如果用没有多少错误的书，或史料价值不高的书，或刻印不好的书，都不适合，选来选去最后选用了沈家本刻《元典章》作为教材。这部书是研究元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书，刻版精致，版式字样美观，但是错误百出。他认为这样的书正是理想的校勘学教材。

他曾在二十多年间，先后搜集购买了这书的四种钞本，一九二五年又在故宫发现了元刻本。一九三〇年夏，用元刻本和沈刻本对校，后又用诸本互校，校出沈刻本错误一万二千余条，便用以作为教课的实例，同时写成札记六卷，阙文三卷，表格一卷，汇集为《元典章校补》，对沈刻本有校有补。后用木板钲刻，字体版式全仿沈刻本原书。凡藏有沈刻本者，可配页装订。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重印木板沈刻本《元典章》时，将所补部分，按页插入；所校部分，附于书后，便于参考。

后来他又在一万多条错误中，选出其中的十分之一，按其致误原因，归纳成四十二例，撰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九五九年排印时，改名为《校勘学释例》。

这书虽只是以校勘《元典章》一部书为例，但对校勘古书时常遇到的种种情况，校出错误怎样辨别是非，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错误等等，都做了解释、分析。

这书对如何进行校勘，不是凭空设想的，而是从实际出发，是在他反复实践中得到的经验，经过研究、提炼，找到的总结性的规律。

书最后将校勘的方法，概括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称之为“校法四例”，至今为校勘工作者所遵循。后来，我作为他的助手，帮助他点校新、旧《五代史》时，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按着这办法校勘和分析的。这种校勘办法，既能发现错误，又能改正错误，又能证明所改不误，是极细致复杂的工作，有了《校勘学释例》作参考，可以大大地提高校勘质量。

他所写的文章，对史料鉴定，史实考核，精辟确切，很多都是因为运用校勘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后来他用《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校出大量异同，将其中一百九十四条选出，写成《旧五代史辑本发复》，用实际例证揭露四库馆臣窜改古籍的秘密，这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校勘学做出的贡献。

他一贯重视史料的整理工作，二十年代他已呼吁要赶快努力对史料进行整理，希望能及早抓起整理史籍和档案的工作，并拟出整理办法，有整理史籍八法，和整理档案八法。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加这项工作，包括整理唐以来的笔记、文集，编笔记、文集子目、总目索引，群书篇目汇纂，重要书籍索引，分类专题编集，整理和新编工具书等等。

一九二九年，他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讲的《中国史料的整

理》（见燕大《史学年报》第一期）里说：

我们若是肯从此努力，把我们的史料整理起来，多做机械的工夫、笨的工夫就可以一人劳而百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了。

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说有些人不屑于做这类工作，是很不应该的。他认为：“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他自己是不惮劳烦为我们作了多种这类工作，几十年来方便了后学，帮助了读者。今天，每当我们便利地使用他编写的这类书时，仍然会感谢他为史学界和我们后辈付出的辛勤劳动。

（三）

陈垣同志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对反动统治不满，几十年间；采取“不问政治”的政治态度。北平沦陷后，他因种种原因，未能离开北平。在这期间，他杜门谢客，西涯著书，除教课到学校外，足不出户，不与外界来往，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敌伪政府不断威胁利诱，企图利用他的声望，逼他出任伪职，都遭到他严词拒绝。这时，他在敌人铁蹄下，精神极端苦闷，生活异常艰难。八年间，他独处枯城，不仕敌，不投降，铮嵘傲骨，大义凛然。他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和课堂的教学里，尽可能地宣传爱国思想，教育群众要有民族意识，保持民族气节，暗示大家抗战一定能胜利，祖国一定能恢复。又教育同学不可灰心丧志，要学好本领，积蓄力量，以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能做愧对祖国的事情。

他的史学著作，在这时也有一大转折，过去他的文章多表现真积力久的工夫，很少发议论，从抗战开始，他的文章中，多议论感慨，抒发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无论是“宗教三书”和《通鉴

胡注表微》等专著，还是简短文章如《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全谢山联姻春氏》等等，无不反映了这一中心思想。

抗战后他撰写的第一部专著是《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清四库馆臣做辑佚工作时，有人是为了迎朝廷所好，有人是怕触犯时忌，引起杀身灭族大祸，故凡遇朝廷有忌讳或易引起误会的字句，都不愿或不敢书。陈垣同志把主要在《册府元龟》和《永乐大典》中辑录编纂的《旧五代史》校勘一过，把校出的因嫌讳避忌而删改的字句，综合为十类，钩勒出所改的都是些什么内容，一来为发《辑本旧五代史》之覆，并通过典型以了解辑佚工作中的情况；二来也是因他当时在沦陷区，身有感受，而写此书，所谓“其外之虔恭愈甚，斯其内之厌弃也益深，君子观人心之未亡，而知国事尚有可为也”。

这书脱稿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但收在《励耘书屋丛刻》中时，日期改写为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后来告我说：“这书是‘倒书年月’，以掩人耳目，避敌伪注意。”他说这是刻此书时的一个秘密。每谈及此事，他总是说完就拈须仰首而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开始动手《明季滇黔佛教考》的撰写。他在藏经中摘录的语录，大多是明末清初遗民逃禅为僧的人，语录所述多外典史籍所不载，其中不少史料很有价值，皆前人未曾注意，尚未发掘利用，特别是有关东南和西南的珍贵材料。西南滇黔是明桂王建立政权所在，东南是明唐王、鲁王建立政权抗清地区。很多当时当地的问题，在内典记载中可给史书得到补充。

《明季滇黔佛教考》是借写西南知识分子因不仕清朝，逃入佛教为僧的历史，主要以表达作者自己身陷敌区，对祖国无限怀念之情。书不名“清末”，而言“明季”，更有其深意所在。他在总目后短序中说：

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邠居岐。……

当时北平沦陷，学人多奔赴抗战根据地，敌人在沦陷地区残暴横行，至有“变衣易俗”、“披发左衽”者，书中写述他身居北地，对祖国怀念、对后方向往的深情。

书里他也谴责国民党当政者失地误国，抗战不利。卷四《深山之禅迹与僧栖》最后按语：

按祖宗之遗我也厚矣，似此广漠无垠之土地，取无尽，用无竭，进退绰有余裕，吾何修而得此！乃我父老昆弟，优游卒岁，淡然置之，徒使三五细流，托足其间，刀耕火种，是自弃也。诗曰：“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岂不痛哉！

敌人长驱直入，国民党节节败退，大好河山，沦入敌手，钟鼓财富，拱手贻人，“岂不痛哉”！

书里写了不少典型人物，斥责了屈膝投降、甘为汉奸走狗之徒；赞扬了宁死不仕敌伪的忠贞不屈之士。

脱稿后，将稿本辗转寄到在云南执教的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为此书作序，讲述了两人的交谊。叙中说：

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南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丁丑，一九三七年。二人“南北相望”，“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不但在大后方的人能“未树新义”，就是在沦陷区生活在险恶艰苦的环境中，也仍能保持风节，洁身自好，未负祖国！

次年（1941）发表了《清初僧诤记》，讲清朝初年东南法门内部的纷争。内容主要说以继起弘储为代表的故国派和以木陈道忞为代表的新朝派之争，虽写宗教派系的矛盾，实反映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

书中不但把清初东南法门纷乱的问题简练清晰地分析论述，对研究佛教史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甘心附逆、投降仕敌的人予以严厉抨击。

同年，又发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此书是借写南宋初年金人统治北方后，北方学者先后创立与道教旧派不同的三种新道教，即全真、大道、太一。通过传道，团结一部分群众，自谋生活，不作金朝的官。

三教的创始人皆北宋人，而创教则在金朝。因他们都义不仕金，故书名称“南宋初”，“从其志也”。宋南渡后，“河北黄舍为墟，士流星散，残留者或竟为新朝利用，三教祖乃别树新义，聚徒训众，非力不食”。三教祖都是北方学者，授徒传道，与金元二代相始终。

他认为仅仅不给敌伪工作还不够，还要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和提高文化水平。卷一《全真篇上·藏经之刊行》：

全真家刊行道藏，将以承道家统绪，留读书种子也。……若因不仕而不读书，则不一二世悉变为无文化之人，此统治者所求而不得也，故全真虽不仕，书却不可不读。……道藏包涵中国固有杂学，如儒、墨、名、法、史传、地志、医药、术数之属无不备，固蔚然一大丛书也。能寝馈于斯，虽伏处山谷，十世不仕，读书种子，不至于绝，则全真家刊行道藏之意义大也。

他教课时，也常谆谆告诫同学：虽暂居沦陷区，切要抓紧时间读书、学科学技术，以积蓄精力，不读书则中国尽成无文化之人，

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

抗战时期，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通鉴胡注表微》，是他一部精心之作。

当他读到《通鉴注》中有：“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有“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他每读到这里，面对着当时自己的困难处境，深有感触，甚至“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从《通鉴注》的字里行间，他发现了胡三省的真实思想感情，从而决定进一步将这个人物的著作，加以全面研究。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宁海人。生当宋末元初，正是民族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四十七岁时临安失陷，宋亡隐居，集中精力注释《通鉴》，一直到他七十三岁逝世前，前后注书二十七年。在《通鉴注》里，胡三省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但历来总认为他只是擅长地理和考据，对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从来没有人注意和研究过。

在《表微》的《重印后记》中说出了撰著目的：

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

在这部书里，他用含蓄而坚定的笔法，巧妙的论证，独到的见解，倾诉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把自己的思虑、感情，融贯在全书之中，他怀念祖国，痛恨汉奸，抨击敌人，表扬忠贞。选用胡注七百五十多条，“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没有胡三省的遭遇，写不出这样的《通鉴注》，没有陈垣同志的遭遇，也不

会如此深刻、全面地了解胡三省，也不可能为胡注阐幽发微，写出这部《胡注表微》。

抗战八年中，他忍着极大的痛苦，眼见祖国河山破碎，百姓困苦颠连，知己的朋友、学生，前后离开了北平。他处境异常艰苦，写作受箝制，言论不自由，压力很大，且消息闭塞，心情苦闷，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他总是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安危胜败。他一直未尝休息过，每年担任讲授两门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还撰写了专著论文七种，短文十几篇。不论是教学还是著书，他总是设法避开敌伪的监视，用讲历史的内容，以史为鉴，宣传抗战必胜信念和爱国主义思想，在可能的条件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

(四)

综观他的史学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广。他研究宗教史，从四种外来古教到世界三大宗教，都写有文章。他对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四库、敦煌，都有较深研究，由于他长于元代历史，所以有人称他为“元史专家”，其实元史仅是他研究的一个方面。

他掌握的资料丰富，经史子集无不熟悉。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实事求是，为文求本溯源，追根究底，脚踏实地，不尚空谈。

由于他学习过医学科学，具有唯物主义思想，这对他后来研究史学，有很大影响。

解放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常恨自己“闻道太晚”。旧社会人称他为“史学大师”，他说：“我不愿作旧社会的史学大师，我要作一名马列主义历史研究的小学生”。解放后

他写的史学论文较少，有人问他正在准备写什么史学研究论文，他说：“我还不忙于写史学论文，我现在主要是学习马列理论，我要先进行‘政治补课’，改造思想，然后再谈史学研究。”这就是解放后他在史学研究上的态度。

总之，他的一生，治学勤苦，著书不辍，撰写了近二百篇学术专著和文章，在这些论著中，展示了他的才能和工力，凝聚着他几十年的心血。他的文章，大都是经过缜密的组织，有坚实的论证，往往能得出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结论，在国内外有较深的影响。

他开始学术活动，是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他吸取了传统的方法研究历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大大的进展和提高，并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远远超过了前人，作出独创的贡献，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当然，由于他思想和时代的局限，著作中不可避免的还存在着缺点，有些问题还有待商讨。

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虽然在他身边学习和工作了三十多年，但因其他工作任务较繁重，自己时间少、水平低、领悟差，更因为他的史学研究涉及面广，学问博大精深，“夫子之墙数仞”，所以对他学术思想的理解、认识尚浅，不少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学习、研究、探索。但他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和勤谨的治学态度，都将永远是我的楷模，并给我以鼓舞的力量。

1980年8月写于北京师大